

# 人生要有追求

龚育之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学苑往事文丛

# 人生要有追求

## 人生要有追求

龚育之

龚育之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要有追求/ 龚育之 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4

(学苑往事文丛)

ISBN 978-7-5415-3486-7

I. 人... II. 龚... III. 龚育之 (1929~2007) —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4307号



## 人生要有追求

作者 / 龚育之

责任编辑 / 刀祝威 杨云宝

书籍设计 / 陈 旭

责任印制 / 荣 璟

出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 云南教育出版社

开本 / 889×1194 1/32

印张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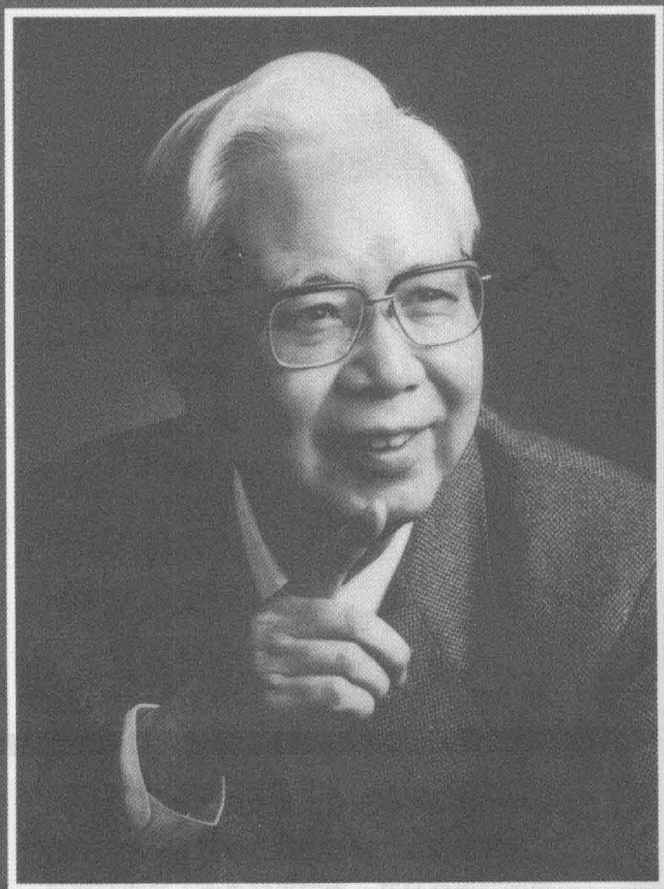
字数 / 175000

版次 /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装 / 昆明雅昌富新春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415-3486-7

定价 / 20.00元



# 龚育之

1929-2007

龚育之先生在晚年仍孜孜不倦地阅读自己的著作，  
追求科学，追求革命。阅读此书，你能收获许  
多知识，并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 龚育之理论和学术生平简介

龚育之，原籍湖南长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在吉林长春、天津和湖南先后读小学、初中，在湖南明德中学读高中。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任干事，后相继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学术秘书、副组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下放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其间，曾借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调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一九八〇年一月任副主任。不久，该办公室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仍任副主任。一九八八年三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九一年九月不再担任副部长。一九九四年三月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一九九五年六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一九九九年三月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

龚育之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他是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曾在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的主要兼职有：中国科协常委兼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等。

龚育之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科学技术论和自然辩证法，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

在科学技术论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方面，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陆续发表文章，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一九五四年，他编译出版了列宁、斯大林关于科学技术工作论述的著作《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一九五六年，他在于光远领导下，参与制定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参与创办和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一九五七年，他参与翻译出版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著作《控制论》，首次确定“控制论”的汉译名。一九六一年，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自然辩证法研究文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影响广泛而久远。一九六二年起，他作为导师之一，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招收和指导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化，龚育之的研究重点虽已转向，但始终保持着这方面的兴趣。关于毛泽东、邓小平对科学和技术的论述、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发展、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等，都是他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他出版的著作有《科学·哲学·社会》（一九八七年）、《历史的足迹》（主编，一九八九年）、《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一九九六年、二〇〇五年增订）、《科学的力量》（合

著，二〇〇一年）。他发表的《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等文章，他在中国科协参与组织和坚持多年的“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系列座谈会，以及他所作的“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等报告，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龚育之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理论观点，其中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共命运”，认为迷信泛滥，科学精神受损害，马克思主义也必定受损害；第二，对“伪科学”作出界定，认为伪科学就是“用‘科学’的名义，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来宣传迷信和进行诈骗的学说和行为”，明确了反对伪科学的目标和界限；第三，比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了“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的观点，大力倡导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第四，竭力提倡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认为“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方面，龚育之不仅主持或参与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大量著述，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而且持续性地作了大量深入独到的研究，造诣深厚，成果丰富，建树卓著。其主要代表作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主编之一，一九八三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一九八六年）、《在历史的转折中》（一九八六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九八八年）、《思想解放的新起点》（一九八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负责第六、七章，一九九一





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一九九一年）、《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一九九二年）、《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一九九三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九九四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合著，一九九四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一九九五年）、《论旗走笔》（一九九七年）、《大书小识》（一九九八年）、《在漩涡的边缘》（一九九九年）、《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一九九九年）、《龚育之文存》（二〇〇〇年）、《党史札记》（二〇〇二年）、《中国改革的理论之旗》（二〇〇二年）、《龚育之自选集》（二〇〇二年）、《重读邓小平》（合著，二〇〇四年）、《党史札记二集》（二〇〇四年）、《独特的超越》（二〇〇八年）、《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二〇〇八年）、《党史札记末编》（二〇〇八年）。

龚育之非常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史实的梳理、考订。他对文献、史实十分熟稔，常有独到而新颖的重要发掘。他介绍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听毛泽东谈哲学；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关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谈话；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鲜为人知的多次论述；毛泽东、邓小平著作编辑出版情况；建国以来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经过；以及他对党关于“民族自治”的决策、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开国盛事三个重要细节的考订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产生了极大的持续性的影响。

在梳理史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广博知识的龚育之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关于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孙中山、



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伟人；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关于新中国过渡时期主要矛盾具有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关于新中国头三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三年的党史应该以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来统领；关于以“两个发展趋向”观察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将“两个发展趋向”贯穿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关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整个建国以后党史的标志，从建国到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前篇，三中全会以来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新篇；关于三中全会以前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接续了以前的正确探索和努力，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又有许多新的探索、新的开拓和新的创造；关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两个宣言书；关于“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独特超越，在于纠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三者的结合；关于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理论上有三大创造，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关于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包含了许多巨大的，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等等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或者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或者为理论界、学术界广泛关注，推动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深化。

龚育之的理论和学术研究，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特征和实践目的。由于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他的研究



同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在紧密联系实际方面，在以研究成果提供中央决策参考方面，在对中央决策进行有系统的理论论证、阐发和评论方面，做到了既准确又有相当深度。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发表的《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党的十二大后以《红旗》杂志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九八二年《宪法》通过后发表的《论宪法实施的保证》；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后发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概括》；党的十三大后发表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文；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久发表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党的十四大后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线索和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等文；一九九三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发表的《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与郑必坚、逢先知合写）；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后发表的《新的伟大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后发表的《今天中国的时代的真理》；党的十五大后发表的《旗帜·灵魂·标志》（与郑必坚合写）、《三次巨变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由来》等文；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后发表的《七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三次三中全会讨论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历史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时发表的《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后发表的《国有企业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周年发表的《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党的十六大后发表的《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发表的《独

特的超越》等文章，都具有相当分量和广泛影响。他的研究从历史的纵深和时代的高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当事人和见证者，龚育之还写了许多回顾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文章，披露了许多史实包括细节，为研究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他写的系列“党史札记”，受到各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龚育之的座右铭是：

“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

“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

（汤应武 韩钢）



## 目 录

- 1 忆往：读毛和编毛
- 24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
- 56 乡情和往事
- 61 我在清华的三年
- 90 走过来的路
- 115 关于我的经历  
——北京电视台访谈录
- 208 编后记





## 忆往：读毛和编毛\*

二〇〇三年春夏，SARS来袭，北京成为疫城，一时人心惶惶，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单位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就在这些非常的日子里，在北京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和研究的边彦军等几位有心人，为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接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约请，利用防SARS提供的闲暇，编纂了一部大型资料书：《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

编纂者请我写序，我乐于应命。一是为了友谊，二是借此回忆一下与阅读和编辑毛泽东著作有关的一些往事。

### 作为一位著作家，毛泽东总是自写文稿， 自拟讲话提纲

毛泽东不但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作家。他从主办《湘江评论》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说，是以鼓吹

---

\*此文是为《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作的序，原载《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十二期，《学习时报》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民众的大联合”的著作家的身份出道的。年过花甲了，他一度设想不但要从国家主席而且要从党的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退下来做什么？他的首选，还是做个著作家，在报上写专栏文章。

著作，包括写文章、写报告、写指示、写电报、写信函，还有开会讲话，与人谈话，经过记录整理，还是转化为著作。这是他极重要的工作方式，是他的为别的政治家所不及的专长，是他毕生的习惯、风格和爱好。

他一般是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讲话记录，秘书们帮他整理，他总是亲自过问并且反复修改。党内经历多一些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些年国外境外不断有一些传言，我们这里也有人相信，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谁写的，说毛泽东哪部选集中有多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这全属无稽之谈。

## 我向施拉姆介绍解放区各种版本毛选的源流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还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曾经应邀向外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施拉姆介绍《毛泽东选集》版本的情况。我提出一个观点：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其源盖出于延安整风时党内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以及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编选的《两条路线》。这几本书，是为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编选的，包括党的历次重要宣言和决议，党的领导人物的文章和报告，党中央的许多指示；包括代表正确路线的文献，也包括代表错误路线的文献。经过研究

党的历史，经过起草、讨论和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领导层逐渐形成共识：毛泽东是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这样，把收集在那几本党的历史文献集中的毛泽东著作，挑选出来，加以编印，就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了。

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编辑《毛泽东选集》，各解放区倒是纷纷先做了起来。

我向施拉姆介绍了那时各解放区先后或同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五个系统。一个本子在一个地方出了，其他地方照样或基本上照样重印，算一个系统。我说的五个系统是：（一）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我把大连大众书店一九四五年、渤海书店一九四七年重印，晋察冀中央局一九四七年增订、冀东和太岳重印的，都算在这个系统内）；（二）苏中出版社一九四五年编印、胶东一九四六年重印的《毛泽东选集》；（三）山东一九四七年编印、渤海一九四八年重印的《毛泽东文选》；（四）东北书店一九四八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五）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我这个介绍，只是根据文献室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其他图书馆可能还有更多的收藏。

现在这本《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在附录一中详细介绍了建国前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编辑体例和所选篇目。不过没有提到《毛泽东文选》，大概是因为它不叫选集，篇幅也较小的缘故吧。

## 我读香港版散装毛选和花八百斤小米买东北版精装毛选

我向施拉姆介绍时还提到香港民主出版社的《毛泽东选



集》。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在香港读到过。那时，我在上海考完了大学，等待发榜。原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龚饮冰，奉命撤到了香港。于是我到香港我父亲那里作了短期逗留。香港是个特殊的地方，它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中国共产党在那里有半公开活动的相当空间，办了不少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的报刊和出版社，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在这里可以公开发表，我得到了饱读的机会。

在这之前，我在长沙读中学的时候，读到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那是公开发表的；读到过《论联合政府》，那是私下流传的；读到过日本投降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那也是私下流传的，而且只知是朱德的电报，对其口气和文风（对蒋介石称“你和你的政府”）印象很深，却不知是毛泽东的手笔。

在香港，我读到的是冠以《毛泽东选集》总名的一系列单印本，我只读过其中几个单印本，远没有读“全”。



建国前夕，毛泽东与周扬（左二）、茅盾（左三）、郭沫若（左四）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我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参加了地下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啊，《新民主主义论》啊，《论联合政府》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啊，在进步学生间私下流传得就相当广了。毛泽东著作极大地吸引着我。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花了八百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

这部选集精装一大本，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纸张、印制都是最好的。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硬壳的封面已经散落，纸张也开始发黄，因为要查阅毛泽东著作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还得时常翻阅它。它算得上是我的藏书中稀有的一件珍品了。

## 在斯大林动议以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编辑正式的毛选了

一九五一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本书出版的说明》中，一开始就说：“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以前那几部《毛泽东选集》，对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其编辑工作的缺憾来说，这几句话倒是说得很中肯。所以，中共中央有必要编辑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编辑这样一部选集的动议，有许多文章说，是来自斯大

